



《水滸》与金聖嘆研究

张 国 光

中
州
书
画
社



《水滸》与金瓶研究

张国光

中州书社

《水滸》与金圣叹研究

作者：张国光

责任编辑：郑 荣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 11.375 印张 262 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219·7 定价1.05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为张国光同志多年来研究《水浒》与金圣叹的论文汇编。文章打破了过去在胡适《水浒传考证》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金批《水浒》与旧本《水浒》的本质区别、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重大贡献；通过对金圣叹本人及其著作的研究，一反传统的偏见，肯定金圣叹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成就最大的文学批评家，而不是封建反动文人。文章旗帜鲜明，说理充分，言而有据，文笔流畅。对深入研究《水浒》及引起学术界对金圣叹文学理论遗产的重视，有一定的贡献。本书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文学、哲学系师生，中学语文教师以及对《水浒》与金圣叹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干部、知识青年参考。



金圣叹故居内院
(今苏州市海红坊海红小学教师工作室)
苏州博物馆 王水根 摄

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
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
出來

水滸傳寫一百八箇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
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箇人也只是一樣
便只寫得兩箇人也只是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

前 言

2035/14

《水滸》是我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中成书的时代最早，拥有的读者最多，而艺术上又有高度成就的名著。对我国近几百年的农民起义和人民生活，有显著的影响。在国外它也很受重视，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水滸》的研究过去在我国一直还是处于沉滞的状态，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合乎科学的《水滸》学体系。

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的古典文学横遭摧残，而1975年“评《水滸》运动”更是《水滸》的一场浩劫。“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片言只语，对《水滸》全盘否定，只许批判，不许有所肯定。于是大中小学文学、语文教材中，竟摒弃《水滸》。所谓“投降派宋江”就成了他们要诋毁的革命老干部的代名词，影射代替了科学研究，诽谤代替了艺术分析。

现在妖氛已扫，但“四人帮”所留下来的“后遗症”尚待医治；加以《水滸》问题牵涉很广，言人人殊。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水滸》研究工作者，对涉及这部古典名著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对《水滸》的最后定本——七十回本及其评点者金圣叹的评价问题，能够给予解答，或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将来正确而圆满地解答这些问题开辟途径。因此著者不揣浅陋，在中州书画社同志的支持与鼓励下，向读者献出这本论文集，希望得到国内外研

究《水浒》的专家和有志于研究《水浒》的同志的指教，并通过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为较快地改变我国《水浒》研究的沉滞状况，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水浒》学的理论活动的蓬勃开展而尽其绵力。

在此八十年代的第二个春天，我和不少同志一样，都有“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之感。想起寒流滚滚，万花纷谢的岁月，愈觉春风杨柳、山花烂漫的可爱。追述一下这本集子所阐述的观点形成的经过以及它的种种遭际，也许是有意义的吧。

我在旧大学是学历史而又从事古代文学、目录学的研究的。《史记》和金批《水浒传》都是我很感兴趣的读物。《史记》曾被人视为“谤书”，我研究了它一系列的微文讥刺手法。对于金圣叹，我认为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进步传统。他其实是同情农民起义的，不过为了避免文字之祸而不得不仿《史记》用了“一笔出、一笔入”的手法来掩饰自己的本质立场。而只会读表面文章的胡适，仅根据噩梦及某些序文、批文便断言金圣叹是为了呼吁“灭绝”张献忠、李自成等“强盗”而批改《水浒》的云云，诚属皮相之见，未免自暴其浅识。

但是建国以来，学术界还没有注意到金圣叹是我国历史上尚待发掘的进步思想家和应该受到高度评价的文学批评家。人们仍然视胡适的“判决”为不可动摇的铁案，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斥金为“封建反动文人”。拙见以为：金圣叹的问题是评论《水浒》的一把钥匙，而金圣叹这个人又是“我们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必须对他“做艰苦的研究工作”。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我就搜辑了有关金圣叹的论著资料，并找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与金本比勘，参照以其他当时

所能见到的《水浒》诸本。这种比较研究法，使我认识到：一切以“忠义”标目的《水浒》，从思想体系上说都是宣扬投降做皇朝帮凶的反面教材。其中的宋江就是个大投降主义者的形象；而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才起了“质变”。因此，它广泛流传了三百年，成为淘汰旧本的优胜者。

于是我在两三年中写了一批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为中心内容的论文，并把基本观点归结为八个字：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我是一九五四年底正当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高潮中，向报刊投寄这方面的稿子的，而恰好《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者就是贬斥金圣叹和一贯为“忠义”宋江辩护的同志，拙作之不能发表，自在意中。一九五七年春，在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励下，我把几篇稿子寄请茅盾同志审阅，承茅盾同志在百忙中回了一信，并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勸勉之，还将拙稿转请周扬同志处理。这封信对我是莫大的鼓励，而且还在一个较长时期起了为我减轻所受压力的作用。这是我应遥致谢忱的！

在我接到茅盾同志信后不久，收到了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同志的来信，说拙稿已由周扬同志批交他审阅。还说他过去对金圣叹就有好的印象，但这个问题牵涉很广，需要多看些拙作，还要让他有较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以后就又寄给他一批稿子。可惜为时不久，巴人同志就因为论人性的文章被点名公开批判，我也就不好再与他联系，后来只好索回拙作。

一九六二年，报上出现少数有限度地为金圣叹说话的文章，这本是好事。谁知次年七月，《新建设》就发表了《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这样声色俱厉乱打棍子的长文，一下子又使学术界

对此问题噤若寒蝉。

一九六四年四月，拙作《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发表后，虽然有不少同志为我理直气壮地替金圣叹翻案，还翻了历来《水浒》评论之案，而由衷地称快，视为惊人之一鸣。但由于它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流行的《水浒》论点，触着了某些权威的痛处，于是我的论战的对方就组织了人马，利用职权，接二连三地在北京几个报刊上对我大张挞伐。他们不仅对金圣叹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且横加我以“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散布封建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罪名。所谓“不许……替反动文人金圣叹翻案”之类的大文，连篇累牍地出现于某些报刊，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十年内乱以前几年，极左思潮就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泛滥开了。好在我并没有患神经衰弱症，每当他们的批评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天内，我就逐一写出反批评的文章，逐条逐段驳答对方的诘难，并向各地的学术刊物投稿。尽管这些驳答的文章在当时都未能刊登，但终于抑制了对方的汹汹之势。《学术月刊》还发表了华东师大齐森华同志以公正态度写的报导。

在十年内乱中，我和一些同志一样，“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舍恐惧则闲无事”，故对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水浒》评论作了系统的评判，认为美化《忠义水浒》中的投降主义思想内容，是那一时期《水浒》研究中的主要偏向。

一九七五年，“四人帮”继“评法批儒”之后，又花样翻新，搞起“评《水浒》”运动来，借此诽谤中央领导同志，以图篡党夺权。其御用的写作班子炮制的及随之而起的连篇累牍的《水浒》论文，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水浒》，一个宋江”论。他们的公式是：宋江只有一个形象，即投降派。其目的是牵强附会地把中央领导同志与这个宋江划等号，从而强加以“投降

派”帽子。而拙文的公式则为“两个宋江”论，即一种《水浒》中的宋江是投降派，但另一种《水浒》中的宋江则是革命派。而三百余年来活在人民心目中的宋江，则是革命领袖形象。显然这种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因此，不仅我当时写的驳方岩梁的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连六十年代初我为金圣叹辩解的文章也被“四人帮”的御用文人诬为“掀起为反动文人金圣叹翻案歪风”的罪证。

“严冬过后绽春雷”，当“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被清算之日，也就是我国的科学文化走向欣欣向荣之时。我国正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不再担心自己是站在“地狱的入口处”了。我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且陆续发表一些尘封蠹蚀多年的文章。因此在这个集子出版之日，我除了为我国科学的春天欢呼以外，还要向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十分关心我的科研与教学的武汉师范学院党委负责同志暨学报编辑部的同志深表谢意！一些专家、教授和研究《水浒》与金圣叹问题的朋友，从各地来信，惠我良多，盛意可感！

由于这个集子的一部分文章是已发表在国内报刊上的论战性文章，为了保存原来的面貌，除对排校中出现的错漏字句作了订正外，对原文及论点未作任何修改。这也是照恩格斯所说的“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还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一些单篇论文的结集，所以有些内容交叉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及论据有时稍有重复，除了有些已经加以删略外，有的仍然保留原状。因为删多了，说理就不够充分，祈读者谅之！

在本书出版前夕，我又想到我国唯物主义与民主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他明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但在“身编

彝人，名列囚籍”之后，仍“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而大胆地写了《非国语》，并宣称：“苟用是罪余者，虽百世滋不憾而愿焉！”这种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坚持学术真理与虚心接受批评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的统一。著者竭诚欢迎同志们的任何尖锐的批评！

张国光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武汉沙湖滨之穷目斋

目 录

- 需要从胡适《水浒》“考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读《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异议…………… (1)
- 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
——兼与聂绀弩先生商榷《论〈水浒〉的繁本与简本》一文的
“结论”…………… (21)
- 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评释
——兼谈《忠义水浒传》与此赞序的关系…………… (44)
- 被金圣叹“砍”去的《忠义水浒传全传》的后四十九回
究竟写了些什么?…………… (56)
- 《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
——与邓广铭、李培浩同志商榷…………… (71)
- 再质疑…………… (84)
- 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 (91)
- 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与公盾同志商榷…………… (112)
- 金圣叹关于艺术规律的理论初探…………… (133)
-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论必须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和鲁迅对《水浒》、宋江的
评价，兼谈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 (173)
- 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 (190)

皂白不分，是非难明

- 从金圣叹对《水浒》三打祝家庄故事的批改，看金本与旧本的优劣，金批与王望如增批的好坏……………（208）

去伪存真 由表及里

- 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219）

别出心裁的文学批评

- 谈如何理解金圣叹关于宋江“十不可”的评论……………（238）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 论《水浒》七十一回本与七十回本的思想分歧……………（263）

有比较才能鉴别

- 《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274）

杰出的古典戏剧评论家金圣叹

- 金本《西厢记》批文新评……………（290）

《口技》的著作权应归给金圣叹辨

- 兼谈对“施耐庵”《水浒传序》的两种评价……………（308）

论金圣叹的诗及其反清思想

- 《沉吟楼诗选》考评……………（317）

〔附〕

- 金圣叹与嵇永仁书……………（335）

历史界新近对“哭庙案”性质的评论

- 郭松义同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一文节录……………（337）

关于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问题的不同观点

- （摘录）……………（339）

需要从胡适《水浒》“考证”的 桎梏中解放出来

——读《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异议

胡适在我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对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绩和起过的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我们却不能对他任意拔高、言过其实，甚至把他的缺点和错误也当作是什么“功绩”而称道备至，这样作就不是实事求是，就会弄得是非不分，使读者无所适从的。顷读欧阳健同志的《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学术月刊》1980年5期）一文，就觉得作者对胡适考证《水浒》的文章的评价，多是溢美之辞。作者不加分析地把胡适的《水浒》考证，捧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似乎批判了或不重视胡适的这一考证，就贬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作者还说胡适考证《水浒》的“主导方面是好的，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而究其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作者盛称胡适“既对《水浒》的文学性有充分理解也注意到对其思想性的正确阐发，这就使他确实开拓了一条研究《水浒》的新方向和新道路”。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还在《水浒》考证上有三个“功绩”云云。但据拙见，胡适的《水浒》考证，尽管多至七万字，但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而且错误甚多，影响很不好。今欧阳同志却把它美化到这种程度，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试抒所见质之欧阳健同志，并就教于读者。

我研究《水浒》和金圣叹问题，一向有这样—个观点：《水浒》研究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其原因就是由于不少《水浒》研究者为胡适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水浒》考证所蒙蔽，形成了系统性的错误，积重难返。数十年来，一些泛滥于《水浒》研究领域的不正确观点，追本穷源都来自胡适。尽管解放后一些人写文章也打着批判胡适的招牌，但究其实他们仍然没有能跳出胡适误说的窠臼。由此可见，胡适的《水浒》考证事实上从来不曾被否定过。既然如此，那现在煞有介事地提出“重评”的问题，就显得是无的放矢了。拙见以为摆在《水浒》研究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批判胡适“考证”《水浒》的错误，从而使研究工作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如果今后仍然停留在胡适“开辟”的那条非科学的老路上，肯定是出现不了新成果的。

一、研究《水浒》，应该以批判金圣叹开路吗？

作者盛赞“胡适的《水浒》考证，是以对封建文人金圣叹的批判开始的”。又夸他把金圣叹“作为评论与批判的对手”，似乎是有先见之明，其实这恰好暴露了胡适的浅识：他根本不懂在《水浒》的形成和创作过程以及在对《水浒》的评点中，历来存在着鼓吹封建投降主义与宣传武装斗争到底的两条路线之争，而金圣叹坚持的则是后者，反对的则是前者。我们今天要研究《水浒》，必须站在后者—边，首先从批判封建投降主义的前提出发，弄清它的思想脉络，揭示它的内容主题，这样才算抓住了它的要害。若然，那首先列为批判对象的就应该是《忠义水浒》的原作者（姑认为即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增订者（杨定见、袁

无涯等人)，以及在序跋、评点中大力鼓吹“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和歌颂李逵、吴用、花荣等“服毒自缢”与宋江“同死而不辞”的李贽、叶昼等人，怎么能把清朝斥为“恶薄轻狂，业经正法”而对“跳梁漏网、怨创蔑如”的七十回本《水浒》“妄加赞美”的金圣叹，作为自己的对手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呢？研究《水浒》而把大力清除《水浒》投降主义色彩的金圣叹当作自己的头号论敌，甚至斥责他对《水浒》有罪无功，岂不正好暴露了胡适是与一贯宣传封建投降主义的封建文人，一鼻孔出气的么？

我这样批评胡适并不是深文周纳。因为即使他在1920年及稍后，还没有见到百二十本《水浒》，无从以之与七十回本作比较，看不出究竟是谁宣扬投降主义。但是在1923年鲁迅已明确金圣叹批点《水浒》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之后，胡适还通过鲁迅的转介买到了一部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两相比较，他早就应该看出问题来的。再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还请他为百二十回本《水浒》写了序言，而这篇题名《水浒传新考》的序文又是经过两年之久才写起的两万字的长文，但其中却无一语批判这种本子的投降主义毒素，反而称赞它的一些内容“描写得细腻”云云，这难道不是胡适很欣赏投降主义的明证吗？鲁迅在同年冬写的《流氓的变迁》，义正词严地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它只“反贪官，不反天子”；并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去征讨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宋江等“终于是奴才”。我认为这是对《忠义水浒传》的深刻批判，也是对胡适鼓吹投降主义的《水浒传新考》的旁敲侧击。可惜鲁迅这种可贵见解，长期被人视若无睹。（1975年起受到了重视了，却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全盘否定《水浒》的理论依据，当然是走到了又一极端。）《水浒》研究者之所以不顾金本与旧本《水浒》思想内容上的分